

军事战争与现代国家的建构

——基于欧洲历史经验的理解

袁方成,张翔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9)

[作者简介]袁方成(1978—),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外政治比较;张翔(1988—),男,湖北襄阳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家建构理论。

[摘要]纵观欧洲各国的发展历程,军事战争成为理解现代国家建构的独特视角。军事战争从民族国家、官僚制度和公民社会三个维度形塑着国家的现代形态:在民族国家的维度,战争推动了欧洲国家形态的变迁和欧洲民族主义发展;在官僚制度的维度,战争推动了国家政体和官僚体系的建构;在公民社会的维度,战争推动了公民权利的崛起和现代自由市场的发展。军事战争所带来的现代国家的成长是历史性的非期然的结果。

[关键词]国家建构 军事战争 现代国家

[中图分类号]D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3)06-0016-05

现代国家具有两种属性,一是民族国家,二是民主国家。前者是指在某一固定的疆域内形成对国家的统一认识,搭建国家生活所必须的国家共同体以及国民、国家机器,要求公权力全面控制各种社会资源;后者是指在统一的国家疆域内公权力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规范各个阶层的行为,明确各自的义务和权利,指出国家权力来自于公民的授予^[1]。民主国家建构的理论框架内,包括作为国家制度体系的官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从上层建筑搭建民主的框架;再者是建立公民社会,从下而上地健全公民的各项权利,建构良性的国家与公民的互动关系。因此,现代国家建构主要着力点集中于民族国家的形塑、民主国家官僚制度的建构以及公民社会的培育。

军事战争在现代社会文明进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它充斥着历史的每一个结点,占据着人类历

史的巨大篇幅,并通常处于中心地位^{[2] (P173)}。从历史上看,欧洲长期以来战乱纷争不断,现代民族国家的萌生与成长,正是在这种炮火纷飞的环境中展开的。军事战争与现代国家建构之间是否构成某种内在关联?军事战争对欧洲国家的成长建构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军事战争与欧洲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形塑之间的关联性、与国家制度和国家—社会互动的相关性如何?从军事角度的观察和思考,往往为学界所忽视。

本文尝试从军事战争切入来解读欧洲的现代国家建构,即从军事战争与欧洲民族国家的互动、官僚制度的完善和公民社会的崛起三个层面,探讨欧洲国家建构的内在演进逻辑。笔者认为,欧洲国家或是内在的自发向前,或是在外力下“屈服”迈进,军事战争之于欧洲国家的建构是“无心”或者“有意”地参与进来,在民族国家、官僚政治、公民社

会三个维度上施功发力,推进欧洲国家建构进程。

一、军事战争与民族国家的形塑

传统欧洲经历了多次的国家形态的变动,军事战争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最终促成了欧洲一系列民族国家的产生。民族国家形态的确立与发展,带动并推进了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借助军事因素实现了二者的平稳转向,在民族国家维度上建构起现代欧洲的主体框架。

1. 民族国家的建立

战争历来被认为对人类社会是巨大灾难,对人类社会政治文明是极大破坏。然而,摒除情感因素,军事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代意义上国家的形成、当今社会形态的演进、甚至世界格局的促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军事组织的动力和战争对国家的发展产生剧烈影响^[3]。战争是民族国家兴起的中心,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发动机”的理论曾经一度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4]。

世界各国都通过自己所拥有的各种资源,通过公权力控制的舆论、媒体、教育打造各个国家共同的公民意识,诸如用“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这样的记忆来汇集国民共同的记忆,凝聚国家的意志,这样就形成民族国家。如今各国基本上都是民族国家,但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起源于欧洲。990年以来的欧洲历史中,主要有三种类型的国家在迅速增长:接受供奉的帝国、城邦国家和城市联盟主权分裂的体系、民族国家^{[5](P76)},但只有民族国家在欧洲最早形成并稳稳站住了脚跟。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欧洲的国家形态在进入近代以后发生了多次变动,并且经历了欧洲的霸主国家在欧洲的世界版图上一而再、再而三地易主的事实,最终民族国家成为欧洲国家发展的普遍选择。这主要取决于在欧洲近代史上社会战争形态的变化以及这些战争形态与欧洲各国的国家和城市力量之间的关系^{[5](P217)}。也就是说,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脱离不开发生在欧洲的长期的战争影响,并且这个因素起着主要的作用。

第一,欧洲的战争形态和国家能力之间的互动,直接促成了欧洲国家在国家能力上的飞速提升。欧洲发展历程中的战争形态分为“骑士战争”、“雇佣军战争”、“常规军战争”和“民族战争”^{[5](P23)},每一次战争形态的转换,国家和战争形态都在不同的性质上开始新的互动,这四种战争形态呈现出一种波浪式的推进状态,在不同的阶段,国家所具有的战争能力是不同的。当进行到民族战争阶段的时候,欧洲国家已经开始迈向现代化进程,开始用共同的民族信念这一支撑来动员军民为民族、为国家而战,在战争中民族国家的理念已经在生长了。

第二,战争状态下国家与城市的互动,推动民

族主义助力民族国家的发展。早期的欧洲国家之间主要进行“骑士战争”,加入战争的骑士与国王之间存在着个人间的契约关系,骑士每年贡献出一定时间为君主作战,而国王则给予骑士在其国土内占据一片领地及其它一些特权。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拥有更多的骑士,他们往往会在战争中胜出从而主导欧洲政治。在“雇佣军战争”期间,决定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不再是幅员和人口而是经济实力,富有的城邦国家于是就在国际战争中占据了优势。但是,雇佣军因为对雇主没有情感上的忠诚很容易发动兵变,形成不稳定因素。“常规军战争”在17世纪成为欧洲战争的一个主要形态后,由于城邦国家既没有对于国内百姓的专制能力,也没有必需人口来建立一支规模可观的常规军,因此很快衰落,相反那些既拥有大城市又占有很大周边地区的国家逐渐在战争中获取了主导地位。然而国家仍然面临着军队的离心倾向,民族主义于是就应运而生。拥有民族主义情怀的法国农民打仗异常勇敢,一个时期内所向披靡。这迫使各国争相效仿,民族国家的发展于是就成了历史潮流。

国家只是军事力量的承担者,而不是一种可以使公民权利在其中得到实现的政治共同体,战争创造国家,同时国家也创造战争。吉登斯的研究数据表明,欧洲国家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世纪都深陷战争之中,从16世纪到20世纪整整五个世纪里,统治者们一门心思全放到了准备战争、支付战争费用、弥补战争损失上面了。在1500年以前的五个世纪,欧洲国家甚至更加专注于战争的进行,在这整整一千年里,战争一直是欧洲的主要活动^[6]。因为不仅各个国家都是在战争熔炉里锻造出来的(无论战争是胜还是败,情况都是如此),而且发动战争对于国家的形成过程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只要看看发动战争在政治集权过程、现代国家财税体制崛起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可以得到证明。

2. 民族主义的共生

民族的概念形成于近代以来的欧洲,指的是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中的统治民族,也就是以本民族为主体建立现代国家的民族^{[7](P12)}。民族主义理应包含两个层面: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强调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状态,是每个人对民族国家怀有至高无上的世俗的忠诚,物质层面强调民族主义是一种现实的运动,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寻求和掌握国家权力并以民族主义理由证明这种寻求和掌握国家权力行为正当的运动。现在我们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更多的是将二者结合起来,认为民族主义就是要求使一个族体享有从自治到独立的程度不等的权利的政治学说和运动。军事战争是实现这种转变的手段,军事因素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是历史

上的惯例。19世纪美洲独立解放运动领袖玻利瓦尔就充分地利用了南美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凝聚民族力量投入对西班牙统治者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最终赢得美洲民族解放。我们在探索军事战争视野下欧洲国家的建构问题时,主要是围绕早期欧洲国家发展成为现代国家的这一个时间段来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更多地倾向于它的正面意义,即对于欧洲现代国家成长的有利影响。“理想类型”的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要经历“自在”、“自为”、“自主”三个阶段^[6],在“自主”阶段民族主义就成为民族自省的工具。民族主义认为,各个民族只有在自己的主权国家内才是自由的,因此建立本民族的国家就成了民族主义的目标。欧洲现代国家发展历程中进行的军事战争正是各个国家企图建立自己国家的尝试,通过消灭对方来抢占领地。大众就是通过对内以及对外的力量意识到自己所属的国家的^{[8](P19)}。军事战争在非期然状态下,推动现代国家的成长,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主义与军事战争相结合,实力强大的国家在民族意识的推动下一往无前,赢得胜利后建立民族国家,并引领后续国家的跟进。

欧洲历史上曾发生的数百次战争冲突,以战争为尺度,欧洲的历史研究进程分为主权时代、革命与民族主义时代和20世纪^[9]。在整个欧洲历史上,民族战争始终是欧洲战争的主旋律,尤其是进入革命与民族主义时代,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异常突出。在民族时代以前,民族问题引起的战争主要表现为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而拿破仑以后民族主义的兴起使欧洲民族问题日益复杂化了。一个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往往会得到与其有民族认同感的国家的支持,战争中的民族主义色彩甚浓。1914年战争爆发时,每一好战国政府都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10](P107)}。吉登斯指出,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什么变化,那么民族—国家可能就不会成为战后世界占主流地位的政治实体的组织形式。政治目的是一种衡量战争的尺度,而且这种尺度只有在政治目的对他应动员的群众发生作用时才起作用^{[11](P33)}。战争衔接国家政治,引导国家主权的发展,并如此深刻地把他与公民权及民族主义联系起来,以致任何其他的剧情发展,只能是奇思幻想而已^{[12](P28)}。

二、军事战争与官僚制度的建构

军事战争在现代欧洲国家建构中对欧洲官僚体系的全面建立和现代国家政体的形成与完善上发挥作用,在官僚制度体系的层面上建构现代欧洲。

1 科层制的缘起

官僚体系是国家制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考察军事战争视角下的欧洲国家建构,发现欧洲科层制也与战争不无联系。珥特曼的著作分析了欧洲科层制的发展轨迹,他指出18世纪欧洲某些国家转变成了科层制国家,而另一些国家却依然停留在封建国家的形态,其中的原因就是战争:不同的国家卷入战争的时间不同。由于在公元1450年之前,科层制这一管理模式在欧洲鲜有人知,且当时也缺乏训练有素的科层专业人员,所以在1450年前就已经卷入战争的大量国家只能通过强化其封建国家机器来确保战争的胜利,确立了封建体制在这些国家的地位。而在公元1450年之后,科层制已逐渐被欧洲国家接受,与之相应的专业管理人员亦已大量出现,因此,此后频繁卷入战争的国家就能通过强化科层制来确保战争的胜利,这反过来进一步促成科层制在这些国家的大规模发展。如此,科层制在战争中得到充分的认可,日后在欧洲各国得到广泛的传播,成为至今在欧洲现代制度中广泛采用的一种管理手段。

2 政体体制的确立

现代国家,是一种自立于其他民族之外的、独特的、集权的社会制度,并在已经界定和得到承认的领土内,拥有强制和获取的垄断权力^{[13](P490)}。欧洲的军事战争直接影响到了欧洲现代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从而在制度层面上影响到欧洲现代国家建构。以战争为表现形式的文明的冲突,从根本上决定了欧洲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与走向^[14]。欧洲战争造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在一些近代欧洲国家,战争一方面摧毁了中世纪广泛存在的宪政传统,促成了向法国这样的绝对国家的兴起;而在另一些欧洲国家,中世纪的立宪制度却在战争中保存下来,促成代议制政府的形成,并且一直影响到如今欧洲的政治体系,成为世界上广泛使用的一种政体。唐宁在分析这二者的巨大差异时指出,出现这二者的区别,主要取决于二者在战争中取得战争资源的路径不同:当国家有在国外用的足够财力、物力和人力时,要获得战争的胜利,并不需要从国内汲取大量的资源,这样的国家的立宪制度就会保存;当一个国家在外无力获得力量的时候,为了获取战争的胜利就只得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从国内老百姓身上攫取资源应付战争,这样就会造就绝对国家;当一个国家在国内国外都无法获得资源的时候,就只能走向灭亡。当一个国家在面临动荡之后,政党无力迅速收拾残局的时候,国家将面临厄运。以法兰克为例,法兰克国家体制之所以逐渐形成,在于它在与西方安德鲁斯伊斯兰文明战争中的不断失利。因为这些战争的失利,使法兰克加洛林文明取代了法兰克的墨洛温王朝,还是由于战争,导致加洛林最终坍塌。再加上诸如与伊斯兰文

明、拜占庭文明和维金文明的斗争冲突以及在这些文明之间进行的战争,推动着法兰克社会结构朝着查理大帝王朝的末日转变,遍布于西欧大地的城堡要塞,成为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基础结构,从而在欧洲各地创建起一种松散的分权的政治联邦体制^{[15](P50)}。

春秋时代的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历史发展有着很多的相似性,都经历了频繁战争,但是欧洲形成了一个多国平衡的局面,而中国却走向了秦朝大一统。其原因就在于,古代中国建立了一支以征兵制为基础的国家常规军,以及一个以择优录取为基础的科层制,而欧洲国家却都采取了自衰性的对应和相对笨拙的外交策略,使用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战争物质动员机制,从而在近现代的发展中失去了武力统一的机会。对于后世两类国家的继续发展而言,欧洲最终形成多国平衡竞争的态势,现代政治理论茂盛繁衍,欧洲均势作为一种共识长期存在,而中国大一统后则长时间处于封闭的封建社会,并陷入长期停滞状态。

三、军事战争与公民社会的崛起

公民权理论最早是由英国社会学家托马斯·H·马歇尔提出的,公民身份就是要保证人人都能作为完整平等的社会成员而受到对待,要确保社会成员的公民身份感和国家认同,就必须把日益增长的公民权赋予每个人^{[16](P517)}。现代国家建构除了作为国家自身实体机构的合理设置、国家职能部门的有序运转以外,国家权力的内在规定性必然使其与市民社会中的个人权利相冲突,这就要求协调二者之间“互惠与依赖”关系,完善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有序让渡,建立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平衡力量^[17]。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划定或对市民社会领域的界定,市民社会获得非正式的生命。在欧洲现代国家建构中,军事战争对公民权的唤醒进而推进公民社会的建立起着巨大作用。

1. 公民普选权的确立

公民社会主张维护公民权利,保障公民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而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内的普选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和近代欧洲早期,社会以及宪政结构都有初步的发育,但其后发生了分道扬镳。中国变成一个高度专制的国家,而欧洲国家却建立起公民社会和自由民主制度。导致中国和欧洲走上不同国家形成路径的秘密就在于国际战争^{[18](P4)}。国家卷入军事也强烈影响到公民身份权利的发展及他们与其他社会组织特征的关系。这种影响方式很容易探寻:如果主权国家是一个多元的政治秩序,而这种秩序中的公民身份权利是统治者为了操弄其权力所“支付

的代价”,那么,公民权反过来也就暗含着接受兵役的义务。民族—国家与大规模的军队相伴出现,他们也同是拥有领土边界的政治共同体中公民身份的孪生标记。服役的出现作为公民权的标志,而公民权又是政治民主的标志。服役于公民权利尤其是普选权的关系非常明确,比如,德国一统一,俾斯麦就建立了男子普选权,作为对为新国家付出的牺牲所必须的一种回馈。比较之下,缺少相似革命背景也没有直接卷入欧洲战争的英国,投票权的扩大就被大大推迟了,而只有在经历了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力量遭受巨大损失之后,他们才不得不设征募制,建立男子的普选权。这又一次显然地确认了公民身份权利与军事义务的关联。

2. 公民社会权利的发育

公民社会的组成要素是各种非政府和非企业的公民组织,包括公民的维权组织、各种行业协会、民间的公益组织、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同人团体、互助组织、兴趣组织和公民的某种自发组合等等^[19]。公民社会权利的完善要考虑所有权利主体的利益,满足其利益诉求。

近代欧洲长时期处于战争之中,战争冲突一直贯穿于欧洲近现代进程。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欧洲国家动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税收、债务和国家贷款,以支撑军事战争的进行。可以说国家是被战争牵引着,但是国家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能动性,充分组织动员社会各界。通过与公民的互动,一方面鼓动公民参军作战,另一方面也必须满足公民的各种权利需要。公民权理论分为自由主义公民权理论和公民共和主义的公民权理论,前者强调公民权利,后者突出公民责任。国家为进行最充分的军事动员,就必须作出权力上的让渡与妥协,给予公民必要的福利作为补偿。作为战争的副产品,统治者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开始活动和组织,这些活动和组织都具有自己的生命:法庭、财政、税收系统、地区政府、公众集会等^{[12](P284)}。所有在战争中组织的这些活动,都进一步丰富和扩大了公民权利的范畴。集会、游行、示威等作为公民表达对敌国不满的方式被本国政府接受,而在和平年代,这些权利无疑也用来表达对本国不合理、不作为事实的抗议,成为公民与国家互动中极为重要的方式。公民出版、结社等的权利也在战争中确立起来,一直到如今都是公民宝贵的政治权利。至于服兵役,则是直接与军事战争相连的一项公民责任,一直延续至今。欧洲以战争为分界线,公民权利也发生重大变化:一战之前,欧洲面临严重的失业和公民保障缺失的情况,对此欧洲各国都突出公民社会权,进行社会化反省,强调国家应对公民提供财政和物质上的给付。二战以后的欧洲各国对公民权的认识经

历了从社会公民身份到解放公民身份的转变,进一步扩大了公民权利的范畴,向公民释放更大的权力空间。这也和公民身份从法律维度到政治维度最后到社会维度的认知规律保持一致^[20]。军事战争中国家这种似乎不期然的权力让渡,大大充实和发展了欧洲公民权的范畴,公民权利得到极大完善。

3. 自由市场的发展

公民社会要保障公民自由生活、平等享受商品市场便利、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完善自由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欧洲国家的现代理念是民主国家建构的核心,军事战争对欧洲的现代经济政策都产生了影响,推进了自由市场的建立。政府在进行军事斗争的过程中会不断加强自身权力,完善国家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管控措施,发展商品市场以完善社会生活体系。在第二个千禧年,欧洲发生了双重社会演变,即市场化行为的涌现以及武器和军事组织的持续创新。在欧洲国家以及教会不像高度封建专制的中国儒教那样能遏制市场力量的发展,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依赖市场,是因为他们需要从中牟利来维持与日俱增的军费开支^[21]。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与战争相互促进,二者相互需要,战争的胜利需要市场的繁荣以提供战略物资,战争胜利后开阔的海外市场又会繁荣市场。二者的互动不仅加快了市场经济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并且最终导致了工业资本主义的来临,公民自由权限的扩大。

四、结论

军事战争促进欧洲各民族国家的形成,并使其在各种不同的战争形态作用下成长出各自的国家特质;官僚政治在欧洲国家建构中建立起来,借力军事因素进一步充实完善并反作用于欧洲国家,推进现代欧洲国家成长;公民权利作为一种国家号召公民参与军队的“让渡”开始建立,国家开始与社会划出一种日渐清晰的界限,公民社会崛起之后欧洲现代国家才逐渐成熟。纵观欧洲的历史经验,总的趋势是军事因素在不同维度上助推现代国家的成长。当然,我们单纯只看某个时段或某个具体地区时,会发现军事战争也可能铸成国家的消失或瓦解。军事战争在其不经意间塑造了欧洲的国家形态,但同时也带有巨大的历史灾难性和破坏性色彩。而这一点,在全球现代国家日趋完善的当今,值得认真反思。

【参考文献】

[1] 徐勇. 现代构架建构中的非均衡性和自主性分析[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9).

[2] 马丁·范克勒·韦尔德. 战争的文化[M]. 李阳. 上海:三联书店,2010.

[3] 杰索普文. 国家理论的新进展——各种探讨、争论点和议程[J]. 世界哲学,2002,(1).

[4] 丁家龙. 战争与国家:查尔斯·蒂利国家形成理论的简单述评[J]. 经济研究导刊,2011,(4).

[5] 查尔斯·蒂利.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M]. 魏洪钟.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6] 周丕启. 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J]. 国际政治研究,1999,(1).

[7] 宁骚. 民族与国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8] 入江昭.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M]. 李静阁, 颜子龙, 周永生.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9] 夏保成, 许二斌. 欧洲战争原因论:对中世纪以来欧洲战争原因起因的研究[J].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05,(2).

[10] [美] 罗宾·W·温克. 牛津欧洲史(第三版)[M]. 贾文华, 李晓燕. 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11] 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第一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12] 安东尼·吉登斯. 民族-国家与暴力[M]. 胡宗泽, 赵刀涛. 北京:三联书店,1998.

[13] 戴维·朱勒.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 邓正来.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14] 王沛然, 程丽娜. 文明冲突论视野下的欧洲国家体制探源[J]. 欧洲研究,2010,(4).

[15] 伯克. 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M]. 王新晋. 上海:三联书店,2006.

[16] 威尔金里卡. 当代政治哲学(下)[M]. 刘莘. 上海:三联书店,2004.

[17] 迈克尔·爱德华兹. 公民社会与全球治理[J]. 王玉强, 陈家刚.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3).

[18] 许田波. 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欧洲之比较[M]. 徐进.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9] 俞可平. 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J]. 中国社会科学,2006,(1).

[20] 李攀. 对公民身份双重维度的演变分析[J]. 重庆社会科学,2007,(3).

[21] 麦克尼尔. 现代欧洲史[J]. 现代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84,(7).

(责任编辑 何正欣)